

目 录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诞生和发展·····	周骏鸣 (1)
大革命时期的确山农民暴动·····	李则青口述 王全营整理 (31)
回忆平定起义·····	陈子毅 (45)
张祖渠越狱记·····	刘绍南 (50)
在济源工作的回忆·····	张剑石 (54)
萍乡起义死难义士车钺·····	时明荐 (58)
杜扶东生平·····	高树滋 杜理 (60)
河南死义十一烈士传记·····	原载《自由报》 (65)
任芝铭生平·····	王一达 任均 (72)
陈伯昂自传·····	(88)
张钫事迹·····	黄元吉等 (95)
东征军先锋官王天纵·····	李铭西 (99)
王天纵攻打清兵守备衙门·····	雷蕴吾 (102)
附：谢宝胜历史点滴·····	田丰 (104)
朱丹陛事迹·····	朱香民 (105)
章培余事迹·····	张秉青 (107)
王拱璧事迹·····	王膺民 (110)
杨凤鸣事迹·····	杨应中 王华农 (113)
程克事略·····	温楚珩 (117)
辛亥年河南举义片断·····	王茂亭 (119)
河南“请愿共和不独立”的内幕·····	张遵青 (122)

河南同盟会员与保矿运动·····	张润三(124)
二次革命前后十余年间的回忆·····	秦鼎新(126)
辛亥革命前后诗十六首·····	任芝铭(132)
开封火药库爆炸纪实·····	杜慕堂(136)
开封火药库被炸纪闻·····	张成倬 卢问渠(139)
来稿摘编·····	编者(141)

孙中山先生书写的一份派令·····	陈之华(146)
胡景翼督豫纪闻·····	郭海长(148)
中原大战结束后吉鸿昌部的演变·····	张貌斋(154)

洛阳抗日战斗纪实·····	邢菊田(164)
郭绍绪智歼日本军官十三人·····	吴喜梦(169)
永城县抗日救亡学生队始末·····	丁永年(172)

唐绍仪被暗杀案与赵理君之死·····	艾经武(188)
审讯赵理君、曹银屏旁听记·····	武宪周(194)
附：关于赵理君活埋韦孝儒案的三件资料·····	张振江等(196)
张国焘在军统局的一些情况·····	毋梦綏(202)
附：张国焘情况点滴·····	郭也生(204)

一座志石宝库——新安干唐志斋·····	郭也生(205)
---------------------	----------

〔质疑·订正·补充〕

《河南大学“六二”学潮前后纪实》一文质疑·····	张四德(207)
《中共鄂豫边区党史简述》一文的几点订正·····	编者(209)
《古汴娼妓血泪录》一文的两点更正·····	陈雨门(209)
关于赵倜生平的补充材料·····	张熙清(210)

对韩复榘任河南省府主席期间几点史实的订正·····	刘博仁(216)
对刘博仁所写订正的补充·····	陈牟策(217)
对《解放前新乡蛋厂业发展情况》的补充·····	王仲成(218)
对《张钫事略》一文的几点质疑·····	张应超(219)
黄兴致白朗信与送信人阎作霖的供词·····	李国强(222)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诞生和发展

周骏鸣

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建立于一九二六年六月，是由河南南阳地区和湖北襄阳地区的党组织合并成立的。当时南阳地区的唐河、泌阳、新野、南阳、邓县、桐柏、镇平等县都有了县委组织。

一九三二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鄂豫边区特委改为鄂豫边区省委，机关秘密设在南阳县城。一九三三年夏天省委遭受破坏，同党中央失掉了联系。一九三四年又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到一九三五年初又同党中央失掉了联系，同河南省委保持横的关系，不是直接领导关系。同中央失掉联系后，由鄂豫边区没有被捕的几个同志组织了临时工作委员会，以张星江为工委书记，全中玉为组织部长，张旺午为宣传部长。河南省委于一九三五年初遭受大破坏，同党中央失掉了联系。那时，我是河南省委军委书记，同省委委员王国华及他的弟弟、在中央苏区受过游击队训练的王国平三个人一同去到鄂豫边区，在泌阳县高邑附近张楼马长富家，找到了鄂豫边区临时工委书记张星江和委员张旺午。我们在一块高粱地边开了一个会议，会议由张星江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张旺午、王国华、王国平和我。会议决定，鄂豫边区的党组织同河南省的党组织合并，仍叫鄂豫边区省委，以张星江为书记，全中玉、张旺午、王国华、周骏鸣等为委员。会上还讨论了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决定以确山、泌阳、桐柏、信阳四县边界为开展

游击战争的中心地区，并以铁母山为中心，集中力量开展这个地区的工作。从一九三五年农历八月间开始进行，到腊月初十日夜游击队就诞生了。

一、游击队诞生时的国内形势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使苏区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中央红军被迫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处在低潮时期。蒋介石利用打、拉和收买政策，把中国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局面暂时统一起来了，把各派军阀部队调去“围剿”共产党，由于我党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造成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利。红军转移到陕北后，蒋介石又集中力量向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所在地“围剿”，企图把我党和红军消灭在西北地区。我党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西安事变中，我党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使国内由内战局面转入抗日战争的局面。这些情况当时我们都是不知道的，因那时间中央还未取得联系。到一九三七年初，才同中共中央的北方局取得了联系。这是当时大概的情况。

二、游击队诞生

一九三五年农历八月间，我来到信阳县西北的一个小集镇吴家尖山，在吴家尖山东北约三华里的王老庄，找了一个穷亲戚吴元昌家掩护我们。当时想找一个人家掩护我们干革命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被敌人发觉，就得坐牢，搞得倾家荡产，甚至被杀头。吴元昌对我们掩护得很好，一直很安全，没有发生过问题。以后，在王老庄附近的小石岭村，找到一个在反动军队当过班长的汪心泰，他是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被红军俘虏，经过教育释放回来的。他对共产党非常相信，他六十多岁的老父亲也相信共

产党。他父亲在村里是个长者，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由于他相信共产党，对群众影响很大，对我们工作的开展也有帮助。汪心泰加入了共产党，成立支部时还当了书记。以后张星江、王国华和王国平等经常在这个地区活动。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农历腊月初十）夜，游击队就在汪心泰家里诞生了，当时只有七个人，张星江参加领导，王国平任队长，我任指导员，还有汪心泰、康春、鄂豫皖红廿五军负伤留下治愈的老汪、吴恒山（吴当时不是党员）。长短枪共三支。借周凤森一支汉阳造七九步枪，吴仁甫借了一支八音手枪，两粒子弹还不知是否能打响，小石岭有个姓汪的，用五块钱賒账买了一支撅把子。当天夜里在小石岭村打死了一个保长，缴了一支三八式步枪，没收了两条被子。五个人到铁母山东边小山顶庙里宿营，庙里住了胡老二的一家，他掩护刚诞生的游击队在他家住了一天。第二天得到消息说汪心泰的老父亲被保长家的亲戚打死，汪心泰本人被抓去送到信阳县坐牢，但他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以后被保释放。

三、游击队的名称、方针和任务

当时我们同中共中央失掉了联系，也无处去请示报告，我们自己商议，定名叫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名称，倒无关重要，老百姓和游击队也都不这样称呼。习惯的叫法是“咱的队伍”。如果时间长了不见队伍来，群众在生产休息的时候就会议论：“咱的队伍到哪里去了，这长时间没见来。”游击队对外摆牌子叫“老共”。如我们夜里经过围子，被围子里站岗的发觉，他们就会放枪报警，以引起周围围子的注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大喊一声：“老共！”他们就不敢放枪了，也不乱喊叫了。如果白天在逢集时打“坏货”，打死了之后一摆牌子，说是“老共打‘坏货’的”，赶集的人听了并不惊慌，而且高兴极了，照常赶集买卖东西。所以游击队名称在当时并不重要。我们的方针是：

打“坏货”，拉土豪，宣传组织群众，扩大游击队，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坏货”这个名称是第一次大革命时群众创造的。所谓“坏货”，指的是专门欺压残害人民的最坏的土豪劣绅和他的狗腿子，人民群众最痛恨他们。我们根据大多数群众的意见，采取镇压的政策，因为不镇压不能平民愤，也不能发动群众。镇压的办法都是杀头，因当时我们的子弹太少了。所谓土豪，指的是比较有钱的地主富农。其中民愤不大的，对他们采取捉来罚款的政策，并且“哀而不伤”，要使他们能出得起，罚了款也不致倾家荡产，不能生活。把他们拉来之后，就进行教育，说明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生活待遇和我们一样，不打骂，不污辱人格。这个政策，实践证明非常成功。被我们拉过的土豪，罚了款，放回去之后，没有发现有坚决反对我们的，而且有很多人还变成我们的义务宣传员。有几个知识分子身份的放回去之后就参加了共产党，现在已成了高级干部。当时我们的力量很小，又失去了党中央的领导，因此，我们根据过去的说法，交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我们就采取了多交朋友少得罪人的政策。那时我们还不懂得什么叫统一战线，连这个名词也不知道。我们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凡是不坚决反共的，广大群众也不大痛恨的，或者愿意同我们联合的，不论是国民党的联保主任、保甲长，或一般的地主富农，我们都同他们联合，不采取一律打倒的政策，只打倒群众最痛恨的“坏货”。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镇压个别的“坏货”，孤立少数，争取团结大多数。我们所以在革命低潮时期，既同党中央失掉了联系，又活动在敌人交通要道平汉铁路西侧，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建立了桐柏山区游击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十四个红色游击根据地之一，就是因为当时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游击队的任务是：游击队是个武装宣传队，每住在一个村庄，首先向村庄的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使他们了解共产党是为穷苦人民谋解放的，主张

打倒欺压老百姓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其狗腿子。我们把周围村庄的群众组织起来，扩大游击队，发展武装力量，保护群众不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其狗腿子的压迫和剥削，并进行抗日宣传，如同以后抗日战争时期的武工队一样。这个办法比过去没有武装的个别宣传效果大得多。游击队打击了坏人，把根据地连成一片，老百姓一般也认为自己是随了共产党。

四、秘密活动

游击队诞生时只有七个人，一支长枪，两支短枪，力量小，所以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活动，这就好象刚出生的小鸟，羽毛尚未丰满不能到处飞翔。我们只能采取秘密的夜间活动的方式，不贴标语，不散传单，不提出那些眼前人民群众不能接受也不能实现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只提出切实可行的“打‘坏货’、拉土豪”的口号。我们白天隐蔽在群众家里，严守秘密，谨防走漏消息，以免被敌人吃掉（一个村庄只能住一夜），到晚上等人都睡觉了再出来活动。这样，敌人摸不到我们的踪影，对我们毫无办法。

五、两次严重损失

一开始，游击队连续打击了几个国民党的反动联保主任和保长，发动了群众，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分掉了他们的粮食，缴了他们的枪，武装了自己，这样，两个多月的时间游击队便发展到三十多人，形势是很好的。一九三六年农历二月间，我们受到了一次重大损失。当我们活动到确山县西北、老乐山东边的杜庄时，因脱离了群众，情况不明，被遂平县保安队包围，站岗的未加抵抗，也未报告就跑了，队长王国平被打死，省委委员张旺午、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吴仁甫和五个游击队员被俘，三十多人损失了九个。张旺午同王国平（外号王大头）住的很近，他亲眼看

到队长被打死，又把头割下来用一个牛笼嘴装着，因头大装不下，只装进一半，外边还露出一半。另一个游击队员的头也被割下来装在牛笼嘴里，两个头让一个人挑着，保安队押着其余七个游击队员往遂平县城去。走到张集的一个稻场里，张旺午说：

“不走了！就撂倒这地方吧！反正是要枪毙我们的，何必再让我们受罪呢！”保安队为他松了一下捆绑的绳子（绳子都勒进肉里去了）。突围出来的十几个同志，集合在一个山头上，为牺牲和被俘的同志大哭了一场。大家擦干了眼泪，又继续战斗。被俘的七个游击队员中，吴狗、柯骡、孙昌、红孩四个小青年，因为是确山县人，被送到确山县枪毙了。吴仁甫、张旺午被送往开封关进监牢（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国共合作时才释放），老兰被送遂平县关进监牢，不知下落。

经过斗争，我们的队伍又发展到三十多人。为了武装自己，决定在农历三月初三，去桐柏县平氏镇古峰山庙会上夺取武器。古峰山是个不大的小山，山上有个古庙，每年三月初三有庙会，会上设两台大戏，周围的老百姓很多都来赶会，烧香拜佛，会场上卖东西的很多，非常热闹，有枪的人家都带着枪来赶会，有些土豪劣绅骑着马带着枪，有的坐着大牛车。这个地方紧靠山区，经常闹土匪，桐柏县政府为了维持会场的秩序，派了一连保安队保护会场。游击队只有三十多人，而且都是新发展的农民，没有战斗经验，武器只有十四支长枪、五支驳壳枪。持长枪的怕暴露目标，未进会场，只有持驳壳枪的进了会场。另外动员唐河、泌阳两县地方党和群众去了一百多人，但都没有武器，临时在会场上买了棍子作武器。游击队由于准备武器，耽误了两天时间，到三月初五才赶到。被动员去的地方党和群众，有些回去了。游击队由确山县境，赶到平氏镇要走两夜，每个人发了一条毛巾，行动时围到脖子上作记号。于三月五日下午约四点钟发动，我首先向一个京货棚卖布的开了枪。他正在卖布，驳壳枪插在腰里，子

弹上了膛，非常警惕。我向他胸部打了几枪，要了他的命，牛得胜缴了他的枪。我的枪声一响，顿时枪声四起，乱棍齐飞，敌人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保安队往天上乱放枪。天色将黑，顺利出了会场。这次因为没有夺枪经验，会场上枪很多，但没有夺几支。由于两夜的行军，又在会场活动一天，大家都很疲劳，夜里行军都喊走不动了，我们对这个地区不大熟悉，原布置好的宿营地，也不知道还有多远。当地的村庄很多，都有围子，没有群众带领是进不去的。于是就在一个没有围子的村庄住下来。这样秘密也保不住了。周围围子里的人都误认为这个村庄有土匪，所以天大明了，还不敢把围子门打开，也不敢下地干活，都注视着住我们的小村庄。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我们正在吃饭，村南边来了有一千多人的土匪队伍，从我们住的村庄附近经过。土匪头叫李合，同我们陈香斋队长是朋友。他告诉我们后边有一营军队追他们。我们估计不会来那么快，想吃完饭再走，哪知估计错了，土匪刚过去不久，一营军队就过来了，我们不得不赶快转移。一出村就同敌军接了火。我坐在地上向敌人射击，被敌人打中右腿，幸亏没有打着筋骨，仍可以行走。当时我使用两支枪，一支新的七九步枪，一支驳壳枪，我把长枪交给张星江，并告诉他我右腿受了伤。跟敌人一开火，周围的围子里也不知道我们是红军游击队，以为是土匪，都出来打我们，很快形成四面包围，形势严重得很，有全队覆没的危险。我们拼命地跑，一面跑一面打，我同张星江、牛得胜、朱老七、老汪五个人在后边掩护。打到天快黑的时候，也快进山了，这时敌人有一个连的前哨部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游击队垮下来了，匆忙往后退，情况危险极了！如不拼命冲出去，就有全部被俘的危险。陈香斋这时指着对面的山头机智地大声喊：“同志们往那里跑呀！死要死在一起，不能让他们捉活的。”他把哨子使劲地一吹，大喊：“冲呀！”接着全队人都一起喊：“冲呀！冲呀！”因为敌人只是前哨部队，人数不

多，很快就被我们冲散了。我们冲出去之后，继续往山上跑。这时子弹已经快打完了，而敌人又转过来死死咬住我们。正在这时，张星江被击中要害牺牲了。有两个敌兵已追到我们面前，喊着要捉活的。我向他们打了几枪，没有打中，枪也卡了壳。我们只好忍痛放下张星江的遗体，连两支最好的枪也来不及取下来，急速向山上冲去。我们冲到山顶上时，天快黑了，敌人也不敢再追了。一检查人数，发现只牺牲了省委书记张星江一人。这次虽然没有在老乐山东边牺牲、被俘的人多，但损失比上次大，因为张星江是我们的领导。同上次突围后一样，在山头上，我们为张星江痛哭了一场，大家决心擦干眼泪再继续战斗。张星江牺牲了，我负了伤，我们就推举全中玉为省委书记，游击队由陈香斋队长和小邓领导。小邓本名邓一飞，四川人，是个大学生，眼睛严重近视，夜里行军有困难，连手枪还不会放，领导游击队很不适合，但再找不到比他合适的人了。这次受损失同上次一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脱离了群众。从此，游击队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六、游击队进入最困难的阶段

游击队成立不久便连续遭受两次严重损失，只剩下十八个人，而且子弹打光了，经费用完，衣物无着。更严重的是：省委书记张星江牺牲时，身上所带的文件和钱无法取出来，落到了敌人手中。敌人知道了我们是共产党，更加紧“搜剿”，使我们暂时不能再开展打“坏货”、拉土豪的斗争，更不能进行群众工作，只能隐蔽在群众家里，每天夜里还必须换一个地方。有几次刚离开一个地方，敌人就去包围，结果他们扑了个空。这种情况给游击队和群众威胁很大，万一被敌人包围住了就会全部牺牲，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就会损失殆尽。当第一次受到严重损失之后，小邓就提出：游击队里主要领导干部太多，万一受到损失就无法补救。他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省委即同意了，并决定在平

氏镇夺枪斗争后，张星江就离开游击队，去抓全面工作，哪知他就在这次斗争中牺牲了。现在处境这样险恶，如不设法摆脱敌人“搜剿”，就可能继续造成损失，以至有全队覆没的危险。这时我想起了在江西苏区瑞金时，朱德总司令对我讲的话：“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即在敌人“围剿”难以摆脱时，就把部队化整为零，以减小目标，便于隐蔽，使敌人找不到；等摆脱了敌人的“围剿”之后，再化零为整，把部队集中起来行动。我提出了这个办法，几个同志一致赞成。于是，决定把十八个人的游击队分为三股：泌阳县地区一股，由全中玉负责，并以他为中心，每月或每半个月召开一次碰头会；信阳县地区一股，由小邓率领；确山县地区一股，由我负责。每股六个人，五支长枪，两只短枪，分散在群众家里隐蔽起来，白天帮助群众生产，夜晚相机开展活动。这个办法可以有效地战胜敌人的“搜剿”。后来，分散在泌阳县的一股，因敌人“搜剿”紧张，无法存身，便转移到群众基础比较好，敌人还不大注意的唐河县活动，其中有两个干部同敌人遭遇，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分散在信阳地区的一股，因在春天青黄不接，没有饭吃，游击队员都饿跑了。分散在确山县地区的一股，在那里打了一个“坏货”，缴了一支长枪，接着又拉了一个小土豪的小孩，罚了他一百五十元。钱虽不多，但解决了我们当时极大的困难，不然吃饭就成问题。但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被罚款的不是地主，而是比较富裕的中农，于是我们又打了一次大土豪，搞到了钱，还了他的那一百五十元。这件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大多数人的称赞，群众到处宣传：共产党不侵犯中农利益。用实际行动去体现党的政策，比空口宣传的力量不知要大多少倍，群众自动宣传比我们的宣传，其效果又不知要大多少倍。事实证明：夺取革命斗争胜利，主要靠我们政策的正确，而我们的失败，也常常是因为在政策上犯了错误。由于我们采取了上述的斗争策略，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敌人的“搜剿”摆脱

了。敌人得不到我们的消息，更无法找到我们的踪影，只好滚蛋了。不久，我们又化零为整。

七、犯了一次错误

游击队又化零为整，继续进行打“坏货”、拉土豪的斗争，并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的力量。一九三六年麦收后，游击队扩大到三十多人。我们计划打确山县石滚河的联保主任赵子敬。石滚河是当地比较大的一个集镇，离确山县城约五十多里，每隔一天逢一次集，周围十几里地的老百姓都来赶集。镇子周围有寨墙，同一个小城市差不多，里边设有国民党政权机构叫联保处。联保主任赵子敬是我的亲姑父，他是个地主知识分子，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他非常相信我，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一九三二年我由中央苏区瑞金县回来，把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情况，向他详细地谈了，还特别把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失败的情况讲给他听，并表示了我的看法：中国的出路只有革命（这是朱总司令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讲这话他也表示赞成。他还借给我八十块现大洋，作为我以做小买卖为名到驻马店寻找党组织的费用。这些，都说明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他虽然当了联保主任，但不是反革命。可当时地方上的党组织不了解这个情况，已经把他的两个护兵的工作做好了，由他的两个护兵动手干掉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提出不同意见，怕人家说我是假革命（因为我在白军中当过军官，所以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唯成份论占了上风，党不敢接收我）。另外打“坏货”是由游击队党组织决定的，所以，大家决定了，我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我当时把上面的情况向同志们说清楚，也许大家会同意我的意见的，但是，因为怕人家说自己是假革命，就没有敢提出不同意见。谁知在执行中又出了料想不到的问题。我们游击队到了石滚河寨门跟前放了一枪，他的两个护兵听到我们的这个信号，就出

来为我们开寨门。这时联保主任正一个人躺在床上抽大烟。谁知那么巧，就在两个护兵出去为我们开门的时候，去了一个替死鬼，是一个专拍联保主任马屁的流氓。夏天的天气很热，半夜了还睡不着，他来找联保主任拍话（即闲谈）。那天，他穿的白裤头，同联保主任穿的一样。两个护兵开了寨门，把游击队领进了寨，按计划转回联保主任屋里去干掉他。他们不知道联保主任屋里来了一个替死鬼。当两个护兵喊联保主任开门时，这个替死鬼出来开门了。两个护兵情绪很紧张，从门缝里见穿着白裤头的人出来开门，以为就是联保主任，便“呼呼”两枪把他打死了。人打死了，他们俩没有再进去看一看。游击队也粗心大意，未进屋去检查一下就都离开了。两个护兵就参加了游击队，同我们一起出了寨。第二天，天还未大明，很多群众就来报告，说：“你们怎么搞的未打中呀！打死的只是个替死鬼。”从此，赵子敬就成了我们的死敌。他很快就到确山县把保安队请来了，在陈冲同我们打了一仗。这一仗，我们牺牲三人，受伤三人。这是游击队化零为整以来第一次同敌人打仗。更严重的是，地方党组织遭到了破坏，汝南县团县委书记孔卡子、确山县委书记陈国典和游击队员罗大云，被敌人捉去在石滚河枪毙了。还把确山县委书记常文治（化名，本名段永健，叶县人）和好几个群众抓去进行严刑拷打（以后取保释放）。这是一次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赵子敬在抗日战争时期继续组织武装反对我们，不知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这就是我犯的一次大错误，每每想起后悔莫及。如果我不犯这个大错误，在研究打赵子敬的时候，敢于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说服大家改变这个计划，赵子敬也不会把保安队请来打我们，我们也不会遭到后来的损失。这个错误牛得胜不同意写进这篇材料，我认为这个错误应当完全由我负责。我不向人民和我们的后代交待清楚，我感到心中有愧，对不起人民和我们的后代，因此，我没有接受牛得胜的意见，还是把它写上了。

八、游击队的战略方针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同党中央失掉了联系，无处请示工作，一切方针政策，都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本身的力量自行决定的。这就如同做买卖，有多大的本钱，做多大的生意。我们的本钱少，只能赚钱，不能亏本，如果再受损失，生意就做不成了。客观的情况向我们提出要求：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避免同强敌作战，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当时的主要斗争方式仍然是打“坏货”、拉土豪，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武装力量，保卫群众不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土匪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谁是“坏货”和土豪，都是以当地群众中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确定的，并由地方党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好。因当地的“坏货”、土豪劣绅都住在寨子里或碉堡里，没有地方党把寨子里的群众工作做好，游击队人数再多也打不进去。所以，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必须和地方党的群众工作相配合，必须把工作做到寨子里或碉堡里。我们曾打过一个国民党的联保主任，他住在寨子里，寨子里还有一个碉堡，如果不事先把碉堡里的工作做好，想打进寨子里去是很困难的。那个联保主任喜欢打麻将牌，我们就安排一个人晚上在碉堡里同他打牌，另外有一个人把我们领到碉堡门口，可以从门缝里看到他们，听到他们打牌说话的声音。在一天晚上，我们组织了几十个没有饭吃的群众，准备分他的粮食和财物。游击队走在前头，进到寨子里时，由预先组织好的一个同志把我们领到了碉堡门口，其他群众先在寨子外边等着。游击队员都蹲在碉堡门前，听着碉堡里打牌说话的声音。当时听到有一个人说，打了这一圈不打了，要回家睡觉了。这就是预先组织好的一个同志给了我们信号，告诉我们碉堡门快开了，要我们作好准备。门一开，就冲进去，先把联保主任干掉，缴了他的枪。接着，把分粮的群众带进

来，分掉了他的财物和粮食。这是游击队成立后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第一次胜利，给没有饭吃的群众做了一件好事，大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员和群众的志气。以后，我们打“坏货”、拉土豪都是用这个办法干成的。只要把工作做好，真正做到不打无把握之仗，没有打不开的寨子和碉堡。土匪成千上万，他们打不开的寨子和碉堡我们都打开了，“坏货”、土豪劣绅怕得很。游击队神出鬼没，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有时候群众领着几个手枪队员在逢集时打“坏货”，打了之后大喊一声是老共打“坏货”的，群众照样赶集，不但不害怕，而且高兴极了。拉土豪，必须把他的雇工和佃户也带上两个。拉出来之后，走到没有危险的地方同土豪谈判，说定向他要多少钱，要他买多少东西，某月某日送到什么地方，还要他绝对保密。如果敢报告敌军或泄了密，立即杀他的头。我们用这个办法一直没出过问题。因为经过两次严重损失和一次错误教育了我们，汲取了经验。从此游击队顺利发展了。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

九、游击队的纪律、生活以及成员的来源

游击队的组织形式，基本上同鄂豫皖的红军一样。这是因为鄂豫皖红军向陕南转移时，从我们这里经过，留下了两个伤员，当了我们的先生。游击队设正副队长和指导员，党支部是领导核心。关于方针政策、行动计划都经支部讨论。还成立了战士委员会，所有战士都参加，是游击队中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罢免或处分包括队长在内的每个成员。如游击队中最有威信的陈香斋队长（化名姓胡，都喊他胡队长），因在睡觉时不慎丢失了两百块钱，战士委员会开会决定罚他扛大米袋。在邓庄铺战斗牺牲时他还扛着米袋。这个办法，在现在看来似乎太民主了，但在当时确实很好，它并无损于队长的威信和指挥，相反地提高了队长的威信。陈香斋牺牲时，全队战士痛哭失声。到一九三六年下半年，

游击队发展到三个分队，一个手枪队，还有一个少年先锋队。国民党《大公报》登载我们有十个游击大队，实际上只有一个大队，一百多人。这时游击队经过半年的实际锻炼，也有了经验，培养出来一些干部，手枪队三五个人可以单独作战。《大公报》说我们有十个大队，是因为我们神出鬼没，到处活动，他摸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地方党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开展工作，其中选送游击队员是一个重要任务。游击队员都是由地方党选送来的贫雇农子弟。他们都是一二十岁的青年，非常纯洁可爱。游击队员都是自愿来参加的，没有什么薪饷制度，也根本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无论队长、指导员和游击队员都是一样，没有一点特殊，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吃饭、穿衣、枪支、子弹都是打土豪得来的。吃饭完全由游击队自己花钱买，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吃饱为止。游击区出产大米，一般吃大米比较多。差不多每天都有肉吃，是请群众帮助买的，一人一次不能买很多，要请几个人分头去买。但时间久了，卖肉的发觉一个庄上有很多人买肉，他就知道游击队在这个庄上住，但他也为我们保密，从来没有泄露过。游击队的生活比较好，但吃饭有一个严格纪律，不准浪费粮食，因浪费粮食是要脱离群众的。游击队员都是贫雇农出身，知道粮食来之不易，所以这个纪律都能自觉遵守。

当时游击队最主要的一条纪律，就是打土豪得来的财物要归公。打“坏货”、拉土豪时，根据需要分若干组，如进了围子和碉堡，分工有抓土豪的，有对付敌人反攻的，有没收食品和财物的。任务完成后，离开战场到达安全地点，全体队员集合，把没收财物全部集中起来。临时组织检查组，检查每一个同志是否有隐藏的财物，检查后就分配财物。凡是游击队员能穿的当场分配给大家，凡是游击队员不需要的，就交公处理。这项工作很简单，不要很多时间就做好了。但游击队不要行李，没收的被褥再好也